

# 鄭用錫、洪棄生八股文之比較—— 以〈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為例

徐志平\*

## 【提要】

鄭用錫和洪棄生都是臺灣古典文學方面的卓然大家，他們的八股文也備受推崇。想要深入了解他們的八股文成就，除了熟讀作品，透過比較也是一種有效的方法。本文概述了他們的八股文內容及特色，並選擇二氏唯一的同題作品進行客觀、具體的比較，庶幾可使二位先賢的八股文特色與成就更為彰顯。

前賢認為鄭用錫的八股文有「根柢深、枝葉繁、氣勢盛」三個特點：根柢深主要指他的經學基礎深厚，枝葉繁指他的文章內容能夠多方面延伸發揮，以上兩點，本文的分析可以證明；然而在氣勢方面，本文認為，由於大量引用經書，鄭氏的八股文較為典重，氣勢上稍遜於洪棄生。

洪棄生的八股文也有「雄渾」之譽，由於他善用排比，確實能夠使文章創造出浩瀚磅礴的氣勢。第二個特色是「批判性」，這種批評具有「寄寓時慨」的色彩。第三個特色是合於「正嘉家法」，也就是「以古文為時文」，「強調文章的雅潔精鍊和行文之法」，

相較於鄭用錫，洪棄生的八股文很少直接引用經典，內容亦不失雅潔的風格，合於「正嘉家法」。

**關鍵詞：**鄭用錫 洪棄生 八股文 臺灣文學

## 一、前言

清康熙 22 年，臺灣始設社學。23 年「新建臺、鳳兩縣儒學。翌年，……置府學。」<sup>1</sup> 此後，「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考試為一生大業。」<sup>2</sup> 至光緒 32 年丙午科，「所有鄉、會試，各省歲考、科考均一律廢止。」<sup>3</sup> 這二百多年間，臺灣士子熱衷於科舉，書院授課亦多以取得科名為目的，可想而知，士子們所撰寫的八股文必然不少，惜因種種因素，留存下來的不多。

現存臺灣士子所撰八股文，大概有下列幾種：

（一）鄭用錫（1788–1858）《述穀堂制藝》，載於《北郭園全集》。<sup>4</sup>

（二）洪棄生（1866–1928）《寄鶴齋制義文集》，載於《洪棄生先生遺書》。<sup>5</sup>

（三）《海東書院課藝》，收錄了 185 篇書院內童生、生員的八股文習作。此書乃 2010 年，由戴炎輝（1909–1992）家屬捐贈給臺灣大學圖書館，游適宏謂此乃「國內目前可見、唯一出自臺灣學子的『八股文總集』」。<sup>6</sup>

（四）《海天玉尺初編》，雍正進士夏之芳（生卒年不詳）在雍正 6 年巡視臺灣兼理學政時，曾將所評試卷輯成《海天玉尺編》2 冊，<sup>7</sup> 此書目前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sup>8</sup> 筆者尚未得見。

---

<sup>1</sup>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4），頁 269。

<sup>2</sup> 同上註，頁 269。

<sup>3</sup> 商衍鎤，《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 193。

<sup>4</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

<sup>5</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臺北：成文出版社，1960）。

<sup>6</sup> 游適宏，〈從《海東書院課藝》概觀晚清臺灣童生八股文教育〉，《北市大語文學報》第 20 期（2019 年 6 月），頁 71。

<sup>7</sup> 見龔顯宗，《臺灣文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頁 216-217。

<sup>8</sup> 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書目錄，有夏之芳《海天玉尺編》2 冊，清雍正 7 年（1729）臺陽督學使署出版。

另有零星篇章，例如徐德欽鄉、會試八股文 5 篇，<sup>9</sup> 謝錫光舉人中試八股文 1 篇、<sup>10</sup> 楊士芳中進士八股文 3 篇，<sup>11</sup> 以及張維垣、余顯榮的進士硃卷等。<sup>12</sup>

八股文長久以來飽受批評，然而洪棄生的好友張光岳（1859–189 在《寄鶴齋制義文集·敘》中說：「吾以為明人之視為俎豆不祧，與國朝諸老之棄如芻狗，皆過也。」他肯定八股文「代聖賢之言，闡經傳之緒，又能囊括古今之材，……其為道也大矣！」<sup>13</sup> 美國學者本杰明·艾爾曼也認為：「顧炎武等 17 世紀文人的批判當時只是少數人的意見，而現代學者竟將其視作主流。」<sup>14</sup> 他舉出 18 世紀晚期李調元（1734–1803）在《制義科瑣記》一書中的看法，認為這部書「儘管指出了科舉制度的諸多不足，但仍充分估量了它對人倫日用的影響。這本關於明清科舉制度的開創性著作，反映了 18 世紀晚期對科舉制度的積極評價。」<sup>15</sup> 不僅如此，他還說：「儒家文化的內化部分地來自科舉考試內容上的限制。它影響到儒家自身道德觀與良知觀的建構，及其社會形象。」<sup>16</sup> 可見他認為，八股文對於儒家教化發揮了功能。

關於八股文「代聖賢之言」，艾爾曼參考了錢大昕（1728–1804）和焦循（1763–1820）聯想到「金元雜劇」的看法，認為這可以使得「八股文這種書寫形式中亦摻入了口語元素，這些元素也使排偶讀來頗具抑揚的韵律。」<sup>17</sup> 其實朱自清也說過：「因為排偶，所以講究聲調。因為代古人語氣，便要描寫口吻；聖賢要像聖賢口吻，小人要像小人口吻。」

---

<sup>9</sup> 見徐志平，〈嘉義進士徐德欽的科舉歷程及其八股文表現〉，《閩臺緣》2019 年第 3 期（2020 年 2 月），頁 29-43。

<sup>10</sup> 見陳運棟，〈謝錫光舉人中試的一篇八股文〉，《苗栗文獻》第 14 期（1999 年 6 月）。

<sup>11</sup> 見楊士芳，〈楊士芳遺作〉，《宜蘭文獻》卷 2 第 1 期（1965 年 12 月）。

<sup>12</sup> 見陳運棟，〈談八股文並介紹清同治辛未科張維垣、余顯榮兩位進士會試硃卷〉，《苗栗文獻》第 13 期（1998 年 11 月）。

<sup>13</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1-2（總頁 2961-2962）。

<sup>14</sup> 本杰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潘瑋琳、張琰、曹南屏等譯，《經學·科舉·文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226。

<sup>15</sup> 同上註，頁 227。

<sup>16</sup> 同上註，頁 227。

<sup>17</sup> 同上註，頁 215。

這是八股文的僅有的本領，大概是小說和戲曲的不自覺影響。」<sup>18</sup> 周作人則強調八股文的音樂性，他說：「八股文裡含有重量的音樂分子」，又說讀八股文時，「耳朵裡只聽得自己琅琅的音調，便有如置身戲館，完全忘記了這些狗屁不通的文句，只是在抑揚頓挫的歇聲中間三魂渺渺七魂茫茫地陶醉著了。」<sup>19</sup> 這話雖然半帶嘲諷，但確實也點出了八股文的抑揚頓挫的音樂效果。錢基博甚至認為八股文影響了康梁的新民叢報體，他說：「有襲八股排比之調，而肆之為縱橫軼宕者，康有為梁啟超之新民文學也。」<sup>20</sup>

在八股文「闡經傳之緒」方面，李旭說：「八股文存世之作，對於《四書》義理的解釋、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點一直沒有被認識和重視，甚為可惜。」<sup>21</sup> 蒲彥光也說：「這一方面（指八股文）的材料及書寫現象，其實相當具有經典詮釋學的重要價值，尙待學界研究與開發。」<sup>22</sup>

除了張光岳提及的「代聖賢之言、闡經傳之緒」，八股文還具有訓練邏輯推理能力的作用。清初王士禛（1634–1711）曾見一有名氣的布衣詩人，卻發現「其詩多有格格不達」者，不解其因，於是向汪琬（1624–1691）詢問，汪琬回答說：「此君坐未嘗解為時文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sup>23</sup> 可見汪琬認為了解八股有助於「明理路」。錢基博（1887–1957）也說：「其為之工者，無不嚴於立界，巧於比類，化散為整，即同見異，通其層累曲折之致，……

---

<sup>18</sup> 朱自清，〈經典常談〉，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臺北：文復書店，出版年不詳），頁 718。

<sup>19</sup> 周作人，《看雲集》（上海：開明書店，1933），頁 148-149。

<sup>20</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3），頁 351。

<sup>21</sup> 李旭，〈八股文淺說〉，收入趙基耀等編著，《清代八股文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6。

<sup>22</sup> 蒲彥光，〈談八股文如何詮釋經典〉，《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6 期（2009 年 3 月），頁 141。

<sup>23</sup> 清·王士禛，〈時文詩古文〉，收入《池北偶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86）卷 13，頁 8。

就耳目所覩，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sup>24</sup>可知錢氏認為八股文不但有助於「文章之工」，更強調文章的「合於邏輯」，蓋即汪琬所謂之「明理路」也。李旭也說八股文「因解釋經典和比偶行文的訓練，培養了士人的分析推演與綜合概括的思維能力。」<sup>25</sup>所謂「分析推演與綜合概括」，正是「通理路」，使文章「合於邏輯」的手段。

長久以來，學界漠視八股文，學者對八股文格式大多不瞭解，因此在整理八股文獻時，出現許多誤讀的情形。例如《全臺文》和《清領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所收錄《述穀堂制藝》的內容，段落和標點錯誤很多，現以《全臺文》所錄鄭用錫鄉試文〈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為例加以說明。《全臺文》所錄該文後半篇的內容如下：

從來貴游之子每多踰閑，故示以典常學校難而鄉校易，倫之明則不以難易殊也。帝王之視學也，期天下以一道同風，所以夏曰彝倫，殷曰人紀，周曰彝教，維皇降衷有恒性，勿謂世族驕淫，教行自近外，此之日用飲食，遂可任其性天也。則夫德有三物，有三不，已統遐邇，親疏而同此意也哉！從來首善之區最關風化，故簡拙之典學校峻，而鄉校寬倫之明，則不以寬峻異也。樂正之造士也，示天下以禮樂詩書，舉凡夏之慙愚，殷之放蕩，周之利巧，惟后綏猷而後乂，勿謂不變。即屏貴介褻嚴外此之族，師黨正無所用其簡稽也，則夫升司徒，升司馬，不仍總朝廷草野而共此情也哉。遵斯義也，通德隆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父老攜杖，而觀德化之成以此也夫。<sup>26</sup>

筆者依據八股文格式，及文意理解後整理之內容如下：

從來貴游之子，每多踰閑，故示以典常。學校難而鄉校易，倫之

<sup>24</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頁351。

<sup>25</sup> 李旭，〈八股文淺說〉，收入趙基耀等編著，《清代八股文譯注》，頁34。

<sup>26</sup> 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臺北：文听閣圖書，2007）冊4，頁331。

明則不以難易殊也。帝王之視學也，期天下以一道同風，所以夏曰彝倫，殷曰人紀，周曰彝教。維皇降衷有恒性，勿謂世族驕淫，教行自近，外此之日用飲食，遂可任其性天也。則夫德有三，物有三，不已統遐邇親疏而同此意也哉。（第五股）

從來首善之區，最關風化，故簡絀之典，學校峻而鄉校寬，倫之明則不以寬峻異也。樂正之造士也，示天下以禮樂詩書，舉凡夏之恇愚，殷之放蕩，周之利巧。惟后綏猷而後乂，勿謂不變即屏，貴介恭嚴，外此之族師黨正，無所用其簡稽也。則夫升司徒，升司馬，不仍總朝廷草野而共此情也哉。（第六股）

遵斯義也，通德隆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父老攜杖，而觀德化之成以此也夫。（收結）

《全臺文》把該文「後比」（五、六股）和「收結」的內容混雜在一起，又由於未詳考文意，因此標點錯誤之處相當多，例如「德有三，物有三，不已統遐邇親疏而同此意」誤為「德有三物，有三不，已統遐邇，親疏而同此意」文意完全不通。按《周禮·地官·師氏》：「以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sup>27</sup> 可知德有三，指的是「至德、敏德、孝德」，是國學中用來教國子的內容。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up>28</sup> 可知物（鄭玄注：物猶事也）有三，指的是「六德、六行、六藝」，是鄉內教學之內容。三德、三物，包含了從國學到鄉學的內容，故說「統遐邇親疏而同此意」，如依《全臺文》的標點，則文意全不可解。

八股文關於分析推理、邏輯思辯能力的訓練，文章抑揚頓挫氣勢和

<sup>27</sup>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210。

<sup>28</sup> 同上註，頁160。

音樂性的效果，以及經典詮釋的意義，都有值得肯定之處。然而對於八股文的誤解和誤讀卻如此嚴重，尤其臺灣士子所撰八股文，更是長期受到忽視。目前所知，僅范文鳳碩士論文《鄭用錫及其《北郭園全集》研究》曾就鄭用錫《述穀堂制藝》中的部分作品做了述評，<sup>29</sup> 游適宏則有〈洪棄生八股文詮題立意試析〉、〈從《海東書院課藝》概觀晚清臺灣童生八股文教育〉二文。<sup>30</sup>

范文鳳對鄭用錫八股文的述評比較簡略，不過她整理了閩縣進士梁鳴謙（1826–1877）的評語，並據以做出鄭氏八股文特色的歸納，謂：「鄭用錫之八股文堂廡宏大，析義論理，深且有據，而對於四比八股運用之妙，可謂存乎一心，達到『得魚忘筌』之境。」<sup>31</sup> 很值得參考。

至於游適宏〈洪棄生八股文詮題立意試析〉一文乃以《寄鶴齋制義文集》部分篇章的「自記」和「評語」為線索，分「熟諳經注，切題闡述」、「循題探蹟，別有心得」、「恢廓題旨，融鑄經史」、「關懷時政，借題託諷」等四個方面，論述洪棄生的八股文「詮題、立意」的表現。全文分析細密而深入，是比較有份量的一篇論文。不過作者也承認這四點是八股文的寫作常態，「既非洪繻所獨擅，更看不出臺灣本地的特色」。<sup>32</sup> 要見出特色必須進行比較，本文即就此努力。而〈從《海東書院課藝》概觀晚清臺灣童生八股文教育〉一文，則透過《海東書院課藝》觀察晚清臺灣童生的八股文教育，歸納為「體認文道合一」、「熟誦四書文句」、「學習詮題立意」、「獲得膏火獎助」等四個重點，對於書院教育有頗為清晰的勾勒。作者認為其中「作者的用筆運思與經學

---

<sup>29</sup> 范文鳳，「鄭用錫暨及其《北郭園全集》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6月），頁49-55。

<sup>30</sup> 分別發表於《輔仁國文學報》第46期（2018年4月）；《北市大語文學報》第20期（2019年6月）。游適宏，〈洪棄生八股文詮題立意試析〉，《輔仁國文學報》第46期（2018年4月）。游適宏，〈從《海東書院課藝》概觀晚清臺灣童生八股文教育〉，《北市大語文學報》第20期。

<sup>31</sup> 范文鳳，「鄭用錫暨及其《北郭園全集》研究」，頁50。

<sup>32</sup> 游適宏，〈洪棄生八股文詮題立意試析〉，《輔仁國文學報》第46期，頁110。



理解，都是尚待開發的文獻資源」，<sup>33</sup> 本文研究鄭用錫、洪棄生八股文，便將針對「用筆運思」和「經學理解」等方面進一步加以探論。

本文針對被譽為「開臺進士」的鄭用錫，以及許俊雅所稱詩文創作「不論在量或質上，都足以居全臺之冠」的洪棄生，<sup>34</sup> 兩位卓然大家的八股文進行探索及比較。為更具客觀性，乃選擇唯一的同題作品，即〈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一題為主要對象，在詳細分析二之文後，進行具體的比較。

## 二、鄭用錫及洪棄生的八股文及其部分特色述論

鄭用錫嘉慶 23 年（1818）參加戊寅科福建鄉試中式第 72 名舉人，後又於道光 3 年（1823）癸未科會試 41 名貢士，殿試則為三甲第 109 名。<sup>35</sup> 鄭氏於道光 9 年（1829）至道光 14 年（1834），以及咸豐 2 年（1852）至咸豐 7 年（1857）間，先後主明志書院講席多年。<sup>36</sup> 鄭氏授課非常用心，楊浚（1830–1890）稱其「泊主講席，批文必逐層分晰，課目輒擬作文一、詩一為諸生式，牆壁粘貼幾滿。」<sup>37</sup> 又說：「先生前後主明志講席，為時最久，及門多聞人，掇巍科者如拾艾然。」<sup>38</sup> 可知其授課之勤，以及造就人材之眾。

從楊浚所述，亦可知鄭氏為了教學，撰寫了多篇八股文。這些八股文，連同他參加鄉、會試的作品，都收錄在楊浚編的《述穀堂制藝》中。《述穀堂制藝》共分 2 卷：卷 1 收錄據《論語》命題者 23 篇，其中包含鄉試文〈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一篇，以及會試文〈切問而近思仁在

<sup>33</sup> 游適宏，〈從《海東書院課藝》概觀晚清臺灣童生的八股文教育〉，《北市大語文學報》第 20 期，頁 88。

<sup>34</sup> 許俊雅，〈鐵漢奇才洪棄生〉，收入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119。

<sup>35</sup> 見詹雅能，《明志書院沿革志》（新竹：竹塹文化資產叢書出版社，2002），頁 74。

<sup>36</sup> 同上註，頁 76-77。

<sup>37</sup> 清·楊浚，〈代擬公請鄭社亭儀部入祀鄉賢祠呈稿〉，轉引自詹雅能，《明志書院沿革志》，頁 79。

<sup>38</sup> 清·楊浚，〈述穀堂制藝序〉，收入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 197。

其中矣〉1篇；卷2收錄據《大學》、《中庸》命題者12篇，含鄉試文〈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1篇、會試文〈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1篇，以及收錄據《孟子》命題者13篇，含鄉試文〈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1篇、會試文〈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1篇。以上總共48篇，每篇皆有梁鳴謙的評點。

梁鳴謙對鄭用錫的八股文有一個概評，謂：「覺其根深、其葉茂，其氣雄直而浩瀚，所謂胚胎於秦漢、矩矱於歸胡者，不其然歟！」又：「即以制藝言，山海英靈之氣，已窺見一斑，夫豈輦悅爲工者可比戴哉！」<sup>39</sup> 梁鳴謙的評論雖然有些抽象，但大致是不錯的。其重點有三：一是根柢深，二是枝葉繁，三是氣勢盛。

梁氏所謂的「根柢深」，概指鄭用錫經學造詣深厚。朱材哲（1759–1869）所撰墓誌銘稱鄭用錫「淹貫經史百家，尤精於易，言理而不言數。」又說他「嘗採各說，著《欽定周易折中衍義》一書，凡數十萬言。」<sup>40</sup>《北郭園全集》的總序中還提到鄭氏「入京供職禮部時，潛心於禮經，有《周禮解疑》（一云《學禮擇要》）之作。」<sup>41</sup> 可知鄭用錫於《易經》、《周禮》，皆有專著。其實鄭用錫在就學階段早已熟讀《四書》、《五經》，從他的鄉、會試八股文便可略窺一二。

鄭用錫戊寅年鄉試所撰的〈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一文，便可以看到他對《易經》的靈活運用。此題出自《論語·衛靈公》，朱注云：「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sup>42</sup> 鄭氏即承「聖人德聖而民化」、「得人以任衆職」兩面立論，該文的「起講」部分如下：

嘗思不言者大造，而時行物生，宗子肖其職，此裁成輔相，象固

<sup>39</sup> 清·梁鳴謙，〈北郭園全集序〉，收入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頁19-20。

<sup>40</sup> 清·朱材哲，〈皇清賜同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晉封通奉大夫，恩給二品封典加四品銜，賞戴花翎禮部鑄印局員外郎祉亭鄭君墓誌銘〉，收入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頁25-26。

<sup>41</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卷首。

<sup>42</sup> 宋·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76），頁106。

取諸泰也。不盡者群黎，而生成教養，君上握其權，此草昧經綸，象又取諸屯也。夫惟懋緝熙，申景鑠，上通帝緯，下愜輿情，斯其德盛。其遇隆，而其治與人，亦遂卓越於千古。<sup>43</sup>

文中標舉了「泰」、「屯」兩卦，這當然不是孔子和朱熹的意思，而是鄭氏的引伸發揮。泰卦的象辭爲：「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sup>44</sup> 這裡的后指君王、天子，天子即文中所說的「宗子」（天之嫡長子），宜效法其天父，財（裁）成、輔相（助）天地而不動聲色，這是有取於「泰」卦的卦象。但是一人不足以治天下，需要有人來教養百姓，「屯」卦彖辭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孔穎達正義曰：「言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如在冥昧之時也。於此草昧之時，王者當法此屯卦，宜建立諸侯，以撫恤萬方之物。」<sup>45</sup> 諸侯既建，萬方安寧，君上自可無爲而治也。鄭用錫引用此二卦的彖、象辭來詮釋《論語》和朱注，是以經解經，有助於文章旨趣的拓展，也可以向主考官炫才，表現自己的經學造詣。

此外，由於這篇八股文的論述對象是舜，因此《尚書·堯典》（僞古文本將後半篇分出爲〈舜典〉）得到大量引述。以第五股爲例：

七十載平成之業，盡起而付諸有鰥，即使濬哲文明，恐難辭水火工虞之任。乃作訛成易，授時早命羲和，至察政窺璣，直行所無事也。昏墊懷襄，治水已咨大禹，至滌源刊旅，第順以為施也。雖其時逸欲戒，率作歌而頌復旦，而慶昇平，人第見重華之天子，則夫明目達聰而神不勞，輯瑞時巡而形不痺，乃知正月上日之格文祖者之自有真也。而遠溯中天，蓋已蔓乎莫以尚也已。<sup>46</sup>

<sup>43</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頁283。

<sup>44</sup> 三國·王弼著，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42。

<sup>45</sup> 同上註，頁21-22。

<sup>46</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頁284-285。

七十載平成之業，指堯在位 70 年。〈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sup>47</sup>「有鰥」亦見〈堯典〉：「有鰥在下，曰虞舜。」<sup>48</sup>「作訛成易」則是化用〈堯典〉中的一整段話，內容是堯命令天文官羲氏、和氏「敬授人時」，即教導人民利用四季耕作：由羲仲「平秩東作」（春耕），由羲叔「平秩南訛」（夏育），由和仲「平秩西成」（秋收），由和叔「平在朔易」（處理冬天改歲之事），「平秩」即從事、處理之意。所謂「作訛成易」，乃是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取後一字將四件事合為一詞。此詞亦見章學誠（1738–1801）《文史通義》卷 1：「《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sup>49</sup>鄭用錫可能參考了章學誠的說法，用在此處，以「作訛成易，授時早命羲和」，與下文「昏墊懷襄，治水已咨大禹」對舉，極其巧妙。

至於「昏墊懷襄」一詞，則脫化自〈皐陶謨〉（偽古文〈益稷〉部分）「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sup>50</sup>「懷山襄陵」亦見於〈堯典〉，偽孔傳：「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孔疏：「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其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sup>51</sup>「昏墊」，偽孔傳：「昏，瞶；墊，溺。皆困水災。」孔疏：「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瞶迷惑，無有所知，又若沈溺，皆因此水災也。」<sup>52</sup>於是而有「咨禹」之舉，而禹也能順利完成治水的任務。

以上僅舉數例，已見鄭用錫不僅熟悉《易經》和《尚書》原文，更能變化活用。針對舜的「無為而治」，抽象的道理和具體的事例皆能顧及，面面具到，極見精彩。梁鳴謙謂此文：「玉券十華，靈書八會。金聲擲地，寶光燭天。」<sup>53</sup>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sup>47</sup> 晉·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 28。

<sup>48</sup> 同上註，頁 28。

<sup>49</sup>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京都：中文出版社，1983），頁 6。

<sup>50</sup> 晉·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頁 66。

<sup>51</sup> 同上註，頁 26。

<sup>52</sup> 同上註，頁 66。

<sup>53</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 286。

至於鄭用錫對《三禮》的熟悉，除了前言中提到的「德有三、物有三」乃《周禮·地官》內容的活用外，下一節比較鄭用錫和洪棄生八股文時，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洪炎秋〈先父洪棄生先生傳略〉稱：「先父幼攻舉業，每遇觀風試輒冠群。性至孝友，有撫孤寡姑，常侍先父書院所得膏火以維生計。光緒十七年以案首入泮，割臺後絕意仕進，不再內渡赴考。」<sup>54</sup> 文中提到洪棄生光緒 17 年入泮，實為誤記，當據《彰化縣志稿》、《臺灣省通志稿》訂正為光緒 15 年。<sup>55</sup> 程玉鳳另舉《洪氏族譜》、洪棄生〈代蓮社賀入泮文〉、《寄鶴齋詩話》卷 3 補證，確定洪棄生入泮為光緒 15 年無誤。<sup>56</sup>

誠如洪炎秋所言，其父「每遇觀風試輒冠群」，《寄鶴齋制義文集》收錄了多篇觀風之作，其中〈事思敬疑思問〉（其二）為「戊子臘月彰化觀風十一夜作」記「第一名」，〈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其二）為「壬辰八月廿六夜彰化觀風作」記「超等第一名」。<sup>57</sup> 此外在洪棄生的未刊舊稿中，有《寄鶴齋觀風稿》，為光緒 20 年作品，收制義 2 篇（《寄鶴齋制義文集》未收）、古文 12 篇、駢文 6 篇、詩 9 首，目錄後附洪棄生自記云：「此期觀風，生員二十題，童生亦二十題，所代作一全本列超等第二名，小半卷列超等，童卷一作四首，古文列上取，一作四首，駢賦亦上取。」<sup>58</sup> 以上足證洪棄生觀風作得到的肯定。

所謂「觀風」，指學政及地方官到任時命題課士，有觀察風俗的用意。商衍鑒謂：「學政案臨於未開考前，……亦有由學政就近詣書院考

<sup>54</sup> 洪炎秋，〈先父洪棄生先生傳略〉，收入洪棄生，《洪棄生先生遺書（一）》，書首。

<sup>55</sup> 陳漢光纂修，《彰化縣志稿·人物志》（彰化：彰化縣文獻委員會，1960），頁 23。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組，《臺灣省通志稿·人物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頁 71。

<sup>56</sup> 程玉鳳，《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新北：國史館，1997），頁 92。

<sup>57</sup> 清·洪棄生，《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3200、3451。

<sup>58</sup> 以上有關兩種觀風稿內容，轉引自程玉鳳，《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271-272。

試者，謂之觀風，乃觀察各地風俗之意，評定後隨時隨地發榜。」<sup>59</sup> 觀風作優等的例有獎賞，洪棄生在《寄鶴齋觀風稿》的自記中說：「近時下車採風，課院校藝，不過借爲應酬炙熱之地。愛才之見，不敵其勢力之心久矣。……故年來絕念，不願與考，以此減博數十千劉叉買酒錢。」<sup>60</sup> 言下之意，只要他願意參加觀風考試，獲賞乃屬當然，可見他對自己的文章很有信心。

然而科舉考試不但考實力，也考運氣，他曾說：「如許一大舉人，非修盡前生福份，亦須嘗盡今生苦債，方好作桂香譜中人物。」<sup>61</sup> 洪棄生自認有實力，卻考運不佳，入泮後四次應舉皆落第。<sup>62</sup> 之後遇到滿清割臺，甘脆「絕意仕進，不再內渡赴考」。這樣的結果，洪棄生當然是感到遺憾與不平的。

他曾說：「僕之駢儷、詩、古及制義，頗可自信。」<sup>63</sup> 落第後他看到登榜的作品，感到不服氣，在〈與悅秋先生書〉提到：「若元魁文，則斷斷不肯相服。……己丑及辛卯之元，尤不快人意，是不可解。」<sup>64</sup> 這封信是他在癸巳（光緒 19 年，1893）年那一次應舉落榜後寫給中學的好友施茨（1848–1909）的，在信中他表達了對施茨的敬佩，也表達對該科「元魁」文章的不服。又說到己丑（光緒 15 年，1889）和辛卯（光緒 17 年，1891）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參加鄉試解元的文章，覺得更不滿意，對於這樣的文章能夠掄元，感到「不可解」。

科舉能否中試，跟主試者的眼光和口味很有關係。洪棄生對主考官的眼光是很有意見的，他在 1894 年第四次應舉時，已對中學不抱希望，在〈與阿宗及門〉一文中道：「賤自去年見闡墨文字，所取半屬眯目。

---

<sup>59</sup> 商衍鎰，《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 9。

<sup>60</sup> 轉引自程玉鳳，《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274。

<sup>61</sup> 洪棄生，〈答家明標問鄉榜〉，收入《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卷下，頁 283。

<sup>62</sup> 見程玉鳳，《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93-96。陳光瑩，《臺灣古典詩家洪棄生》（臺中：晨星出版公司，2009），頁 24。

<sup>63</sup> 清·洪棄生，〈與林幼春書〉，收入《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古文集》，頁 329。

<sup>64</sup> 清·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古文集》，頁 301。



今年此行，早已聽得失於冥漠，只當作山水之遊。」<sup>65</sup> 前一年，他第三次應舉落榜，和李石鶴（1856-？）談及此事，李告訴他：「此年闈中用方、趙家法者，決不中，學陳臥子者可中，余恍然知所以失之。」<sup>66</sup> 在〈與悅秋先生書〉中也提及此事，謂：「其弊只作平日讀方、趙二先生文，失之耳！」<sup>67</sup> 他把這次落榜歸咎於襲用了「方、趙家法」，不合於主司喜好陳臥子（子龍）風格的眼目。

張光岳在《寄鶴齋制義文集·敘》概述了洪棄生的八股文，認為：「所爲文，自金、陳、章、羅、熊、劉、韓、方，以暨吳青獄、錢吉士、王柳潭、李石臺、陳勾山、儲禮執、王雲衢、袁簡齋諸前輩，皆能兼綜條貫。以至思曠之幽、雲李之奇、西堂之艷，皆莫不兼收並蓄。」<sup>68</sup> 這段話推崇洪棄生的八股文能集眾家之長，但未能道出洪棄生八股文的特色。

《寄鶴齋制義文集》共收錄八股文 150 篇，依據各篇題目下所註的日期，寫作時間是光緒 11 年到光緒 21 年，是洪棄生 20 到 30 歲之間練習和應試之作，包括自課、院課、觀風、課徒，以及縣試、郡試、院試、鄉試等。凡應試之作例有評語，也有多篇附上自記。雖然這些評語、自記，角度各異，無法精確理出洪棄生八股文的特色，但稍作歸納，接近「雄渾」的評語似乎較多。例如：「氣力浩瀚，骨格堅凝」、「結體高渾，出語名貴」、「議論清雄，舉止大方」、「鑄局渾堅，鍊氣雄厚」、「雄姿駿骨，顧視非凡」、「筆之高渾，足以式靡振庸」、「出筆豪宕」、「聲情慷慨，氣韻沈雄」、「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文勢如黃河之幹，千里一折，令人不覺其曲」、「議論英銳，筆力雄健」等。<sup>69</sup>

又有署名「鏡邨」的評者，兩次提到洪棄生八股文有「正嘉」時期

<sup>65</sup> 同上註，頁 313。

<sup>66</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3504。

<sup>67</sup> 清·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古文集》，頁 301。

<sup>68</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2963-2964。

<sup>69</sup> 以上分見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2974、2983、2993、3011、3038、3049、3057、3028、3281、3438、3466。

的文風。其一評〈故天之生物〉，謂：「結體高渾，出語名貴，而下文俱在籠罩中，覺方氏小題文不免有探喉卷舌之態，無此高視濶步也。其氣體渾然，尤得正嘉家法。」<sup>70</sup> 其二評〈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一章）〉，謂：「成宏格調，正嘉骨力。淡墨中卻有汁漿，時人目不見前輩文章，宜不能知其得力處也。」<sup>71</sup>

所謂「正嘉」指的是明朝正德、嘉靖，方苞說：「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注，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sup>72</sup> 這段話施士洁在《海東書院課藝·序》也提到，但稍作變化，謂：「迄正嘉間，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而出之，博大昌明，閎深肅穆。」<sup>73</sup> 可見鏡邨稱讚洪文得「正嘉家法」或具「正嘉骨力」，不外以洪棄生的八股文能夠「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能夠「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博大昌明，閎深肅穆」。

鏡邨之說，正合於前文提及洪棄生落第時感嘆自己「其弊只作平日讀方、趙二先生文，失之耳」。方、趙，指的應該是明清八股文的兩位健將方苞和趙南星，方苞正是「以古文爲時文」的代表人物，至於東林黨人趙南星，「其八股制義確多寄寓時慨之作」，<sup>74</sup> 而張光岳也兩次提到洪棄生「目擊時事」，或「借題發揮」，<sup>75</sup> 或「借題抒寫而成」。<sup>76</sup> 在《寄鶴齋制義文集》中，收錄了當年（癸巳 1893 年）的鄉試八股文，其中〈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出《孟子·梁惠王》），篇末收結有這麼幾句：「吾願守故國者讀書而惜先王之所

<sup>70</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2983。

<sup>71</sup> 同上註，頁 3145。

<sup>72</sup> 清·方苞，《欽定四書文》，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86）冊 1451，頁 3。

<sup>73</sup> 清·施士洁，〈海東書院課藝·序〉，收入清·唐贊袞編，《海東書院課藝》（臺南：海東書院刊，1892），頁 4。

<sup>74</sup> 陳才訓，〈由《制藝叢話》看明清八股文生態〉，《北京社會科學》2016 年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26。

<sup>75</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2967。

<sup>76</sup> 同上註，頁 3019。



有也，蓋有世臣而後有親臣也，不知有世臣，而王遂無親臣矣！」<sup>77</sup> 這幾句似乎抒發了個人的感慨，朱注：「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sup>78</sup> 我們不知道洪棄生所指的世臣和親臣指的是哪些人，如果回到 1893 年，那麼親臣便可能是主張變法改革的那些人，雖然 1895 年才有康梁變法，但在此之前變法改革的氛圍早已蘊釀。

19 世紀 60 年代，自強運動展開，主張推行西法。然而洪棄生是反對西法的，其〈西法窒礙說〉謂：「今有仿其法者，而君門九重，堂下萬里，上施一政，下生一弊，民蒙一害，害之不已，至以威迫，又以刑驅，或以詐誘，則無惠政而有苛政，維時之民焉，有不怨叛者乎？故欲行西法，必先為西法通上下之氣者可也，又必先去西法歧視其民之習者而後可也，然而吾終以為難也。」<sup>79</sup> 又有〈中國學西法得失利弊論〉謂：「況西國之法，亦非長久之道，騁其智術聰明，固可以凌無前，然矜門詭，上既傷國家之元氣，下亦長士庶之澆風，何君（如）我先王經國之舊章，豫大之規模，為足歷久不敝乎。」<sup>80</sup> 洪銘水說：「他不是革命派，也不是維新派，而是一個復古主義者。」<sup>81</sup> 這話是不錯的，可能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在鄉試中有感而發吧！

透過以上大致的考察，洪棄生的八股文經常得到類似「雄渾」的稱讚，或被認為合於「正嘉家法」，即「以古文為時文」，此外，有時會具有「批判性」且「寄寓時慨」於其中。這些特色，下一節將透過與鄭用錫同題作品的比較加以確認。

---

<sup>77</sup> 同上註，頁 3510。

<sup>78</sup> 宋·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頁 25。

<sup>79</sup> 清·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古文集》，頁 62。

<sup>80</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101。

<sup>81</sup> 洪銘水，〈洪棄生的「觀風」與「戰記」〉，收入《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 56。

### 三、鄭用錫與洪棄生所撰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一文之比較

這個題目分別出現在鄭用錫戊寅（1818）年鄉試，<sup>82</sup> 以及洪棄生戊子（1888）年的院課。洪棄生此題的院課共有三篇，《寄鶴齋制義文集》收錄「其一」和「其三」，而只有「其三」這一篇有院評以及林乃營的跋，<sup>83</sup> 院評及跋文皆對此文讚譽有加（詳如下文引述），顯見此篇最受書院內師長之肯定，因此選擇這一篇來和鄭用錫的同題作品進行比較。

此題出自《孟子·滕文公》，完整的段落為：「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sup>84</sup> 題目只保留「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一句，省略了關於庠、序、學、校說明的上文，屬於「截上題」。王凱符說：「這類題目的作法忌連上，起講及各股開頭都必須要從文題本身著筆，……而不要連繫上文的意思。否則就觸犯了『連上』的禁忌。」<sup>85</sup> 錢基博說：「其為之工者，無不嚴於立界（自註：犯上連下，例所不許）。」<sup>86</sup>

#### （一）「破題」之比較

鄭文的破題為：「國學無異名，合鄉學而並無異教焉。」<sup>87</sup> 洪文的破題為：「以國繼鄉而學可共者，以國繼鄉而倫愈明矣。」<sup>88</sup>

鄭氏以「無異名」來解釋「三代共之」，再以「合」來說明國學與鄉學合起來一同施行人倫之教；洪氏除說明「學可共」之外，特別強調

<sup>82</sup> 此文收錄於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 355-358。

<sup>83</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3150-3155。

<sup>84</sup> 宋·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頁 69。

<sup>85</sup> 王凱符，《八股文概說》（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45。

<sup>86</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頁 351。

<sup>87</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 355。

<sup>88</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 3150。

「繼」字，認為國學繼鄉學而教，更能使人倫彰顯。二氏對題意皆有完整掌握，且在破題中皆未提及「庠、序、校」，都沒有觸犯「連上」的禁忌。

## （二）「承題」之比較

鄭文爲：「蓋三代國學之共，以其異於鄉學也。然名異而實則同，不可合而得明倫之旨哉？」<sup>89</sup>

洪文爲：「夫國學所以合鄉學，鄉有三代之異，國無三代之異，而原其意，皆以明倫設耳。」<sup>90</sup>

承題要承破題之意，在破題中鄭氏將「明倫」之意含而不吐，承題除進一步強調「名異而實同」以及「合而得明倫之旨」，並正式提出國學、鄉學共同爲達到明倫目的而設教；洪氏在承題中也是從「合」和「異」而立論，沒有就破題中出現兩次的「繼」字進一步發揮，不無微疵。

## （三）「起講」之比較

鄭文爲：

今夫輻輳隆於京都，故列代興賢，必有統宗之地。範圍歸於秩敘，故百族彝訓，不外庸行之常。蓋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其教之仍其名者，所以大統同之量，而學之殊其制者，未嘗有變易之圖，固可綜觀焉而得其義也。庠序校之各殊其號如此，是豈立學明倫之意不盡同乎？<sup>91</sup>

洪文爲：

且京師為觀化之區，新文物者至此而愈急。上國實人材之藪，修禮教者至此而更詳。乃累朝存大同之規，雍宮潁水，臣士不改其觀瞻，而群聖切日用之原，人紀天綱，鄉國胥歸其振作。而後知

---

<sup>89</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355。

<sup>90</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3150。

<sup>91</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355。

不必革而不革者，亦不待求而自求，前聖後聖，有至意存焉矣。  
曰校曰序曰庠，夏殷周之所以立鄉學，夏殷周之所以教鄉人也。  
然所以教鄉人者，夏殷周既著其異，而所以教國人者，夏殷周將  
無歸於同乎？<sup>92</sup>

起講必須再進一步發揮題意，而且「好的起講，本身有一個起、承、轉、合的結構。」<sup>93</sup>

鄭文對仗工整的前二聯是「起」，分就國學、鄉學立說，國學在京城，統同辦理，鄉學於各地，行庸常之教；接下來從「蓋建國君民」到「固可綜觀焉而得其義也」是「承」，分別承接國學與鄉學而論，國學不變前代之制，以便擴充統合前代之教化，鄉學名稱各異，但教學之宗旨不殊，因此可以綜合而觀；「庠序校之各殊其號如此」是轉，前面都強調「同」，這裡則轉出三代鄉學確實稱號不同；最後一句「是豈立學明倫之意不盡同乎？」以設問法「合」到立學明倫之意並無不同。

洪文的「起」亦是對句二聯，異於鄭氏國學、鄉學對舉，而專從京城講國學的重要；接下來從「乃累朝存大同之規」到「鄉國胥歸其振作」亦用兩聯對句，承京城國學歷朝不改，帶出鄉學亦同樣重要，皆聖人用以教化人紀天綱也；自「而後知不必革而不革者」至「夏殷周之所以教鄉人也」轉出國學何以不必革，而鄉學各代所立，用以教化鄉人（暗示鄉人日用已變，故不得不變）；最後亦用設問法，「合」到鄉學雖異，國學豈可不歸於同？洪文的「起講」回歸到破題中的「繼」字，強調國學繼鄉學之後，所教為「大同之規」，因此不必改變。

兩篇的「起講」都符合「起、承、轉、合」的結構，皆天衣無縫，自然嚴謹，難分軒輊。

#### （四）「起比」之比較

「起比」（起二股），「起比是八股文開始的兩股。起比又稱提比，

<sup>92</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3150-3151。

<sup>93</sup> 李旭，〈八股文淺說〉，收入趙基耀、李旭等編著，《清代八股文譯注》，頁23。

須有提綱挈領之勢。」<sup>94</sup> 鄭文的起比爲：

帝王應運而興，類有以新一朝之耳目，矧辟雍鉅制，奚必恪守夫成規，乃殷受夏，周受殷，要未嘗於東學尚仁，南學尚禮，西學尚義，北學尚智之餘，別崇徽號，則事固從同也。（第一股）<sup>95</sup>

聖主乘乾而治，詎無以動一代之心思，矧類璧攸關，何必獨循夫舊制，乃周因殷而殷因夏，究未聞於入學釋菜，入學鼓篋，入學習樂，入學習舞之後，更錫嘉名，則典無或異也。（第二股）<sup>96</sup>

第一股以帝王應運而興，原不必恪守成規，但夏商周三代之辟雍（即國學）皆未別崇徽號；第二股以聖王必有異代而改變的心思，原不必依循舊制，但仍不改國學之名。起二股只提出三代國學無異名之觀察，並不論其原因。

洪文的起比爲：

入學而考德藝，學之中有校也；入學而正齒位，學之中有序也；入學而設老更，學之中有庠也。合萬國之鼙鼓，歸上都之鹿鳴，三代不強為異者，三代亦無待異耳。未與朝野言同倫，先與朝野言同學。而或在安邑，或在亳都，或在豐鎬，學之地不同，學之名則同。撫三代俎豆，而禹湯文武，如在一堂。（第一股）<sup>97</sup>

入學而鼓琴篋，學之事有教也；入學而歌騶虞，學之事有射也；入學而執漿爵，學之事有養也。合數朝之鳳翽，覲一代之龍光，三代憚於屢更者，三代亦無庸屢更耳。陰以彝倫為鼓舞，顯以學術為依歸。而或以忠勝，或以質勝，或以文勝，學之風雖異，學之名號不異。入三代宮牆，而禪讓征誅，如

<sup>94</sup> 趙基耀、李旭等編著，《清代八股文譯注》，頁24。

<sup>95</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355-356。

<sup>96</sup> 同上註，頁356。

<sup>97</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3151。

同一轍。（第二股）<sup>98</sup>

第一股說明國學之內容即包含三代之鄉學（學之中有校、有序、有庠），此亦是承破題中的「繼」字發揮，用現代的話說，即國學是鄉學的進階版。至於國學之地（三代京城）雖異，但學之內容實無異。第二股再論國學包含鄉學之教養，回應了朱注：「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sup>99</sup> 又說三代雖有學風的差別，但不殊其名號。

劉熙載說：「提比要訣，全在原題。不知原題而橫出意議，豈但於本位不稱，並中、後之文亦無根本關係矣！」<sup>100</sup> 意思是起比要切中題旨，不宜橫出議論，否則中、後二比將失去議論的根本。鄭、洪二文都掌握了這個原則，只作現象的觀察，不論其原因，也不作進一步的申論。二文的差別在於，鄭氏揣摩了聖王的心思，而「奚必恪守夫成規」、「何必獨循夫舊制」則是模仿古人的口吻，洪氏則純就國學性質作客觀的說明，相較而言，鄭文更符合「代聖人立言」的原則。

### （五）「出題」之比較

在起二股之後，會有一段「出題」，「出題是從文字上把題目點出來」。<sup>101</sup> 鄭文的「出題」為：「以言夫學，蓋自三代來，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夫國之俊選皆造焉，三代共之，豈非以建學之典，雖聖帝神王，有不可易哉。」<sup>102</sup> 這段話總結前述，說明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國之俊選，皆國學所造就，之所以三代皆同，正因為國學教學的典則是不變的（都是為了明人倫）。洪文的「出題」為：「學則三代共之，此國學所以與鄉學異也。且夫三代之國學與鄉學異，而鄉學之

---

<sup>98</sup> 同上註，頁3151-3152。

<sup>99</sup> 宋·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頁69。

<sup>100</sup> 清·劉熙載，《藝概·經義概》（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5），頁179。

<sup>101</sup> 王凱符，《八股文概說》，頁13。

<sup>102</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356。

明倫與國學同也。」<sup>103</sup> 此更明確將題目中的「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點出。相較之下，鄭文較為煩瑣，且點題較不清楚，不如洪文的簡明扼要。

## （六）「中比」之比較

唐彪在《讀書作文譜》卷9把「起比」（中二股）喻為人的頭臉，「中比」喻為心背，謂：「當進一步搜剔題中反正神理所在之處。」<sup>104</sup> 王凱符說：「中比要回答文題中提出的問題，要把題目中的所以然闡發清楚。」<sup>105</sup>

鄭文的「中比」為：

顧或者謂大昕鼓徵，學兼乎校，貍首騶虞，學兼乎序，適饌省醴，學兼乎庠，而要之立教多端。（第三股）<sup>106</sup>

祇其敦夫本行，則學之為父子，學之為君臣，學之為長幼，其行之於國，有同趨者，即其行於鄉，無異轍也，所以明人倫有皆然者。（第四股）<sup>107</sup>

鄭文在「中比」不用對偶，改引《禮記》之說，暢言題意中國學合鄉學之意，並以教學目的在於「敦夫本行」，即以人倫為本，本此而論，則國學、鄉學並無不同。

鄭氏在這兩股展示了他的經學造詣，《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

<sup>103</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3152。

<sup>104</sup> 清·唐彪，《讀書作文譜》，清·唐彪著，王剛譯評，《家塾教學法：經典譯評版》（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7），頁272。

<sup>105</sup> 王凱符，《八股文概說》，頁13。

<sup>106</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356。

<sup>107</sup> 同上註，頁356-357。



以〈貍首〉爲節。」鄭氏在第三股融合了這兩段《禮記》中的內容，說明爲何「學」可以兼校、序、庠。「大昕鼓徵」，鄭注：「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sup>108</sup> 意思是早晨擊鼓召集諸生，這一點國學和鄉校無異，故說「學兼乎校」；〈貍首〉、〈騶虞〉是天子、諸侯射箭時唱的詩，<sup>109</sup>《孟子》原文說「序者射也」，故說「學兼乎序」；所謂「適饌省醴」，孔疏云：「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sup>110</sup> 這是天子養老的程序，而「庠者養也」，故說「學兼乎庠」。第四股中的「學之爲父子，學之爲君臣，學之爲長幼」也出於《禮記·文王世子》，原文爲：「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sup>111</sup> 這些都是人倫之本，無論在國學、鄉學都是同趨而無異轍的。

洪文的「中比」較長，內容如下：

法制無百年而不敝，夏之學至殷而必敝，殷之學至周而必敝，敝之則必修之矣。然殷修夏之敝而不更夏之名，周修殷之敝而不更殷之名。三代以共之者，示守先之意；三代即以共之者，存待後之思也。儒生則古稱先，而考據未真，謬以變置測前人，而不知變於鄉，未嘗變於國也。河出圖而學如故，國綴旒而學如故，里衍易而學如故。而天秩天敘之長存於三代之間者，無論矣。（第三股）<sup>112</sup>

教養以遐荒而易陋，黨之學至鄉而一陋，鄉之學至國而一陋，陋之則必文之矣。然鄉文黨之學而不能增黨之倫，國文鄉之學而不能增鄉之倫。三代以明之者，著王道之同；三代即以明之者，示

<sup>108</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頁404。

<sup>109</sup> 同上註，頁1041。孔疏：「天子以騶虞爲節者，歌騶虞之詩……；諸侯以貍首爲節者，謂歌貍首也。」

<sup>110</sup> 同上註，頁404。

<sup>111</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頁399。

<sup>112</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3152。



王道之易也。士風日新月異，而根本不植，謬以淹通當學問，而不知學在人以內，不在人以外也。恩義講而人有君親，性情講而人有兄友，陰陽講而人有夫婦。而大綱大紀之長懸於鄉國間，不外是矣。（第四股）<sup>113</sup>

這兩股的重點是：第三股說明三代國學不變之故，在於「守先、待後」；第四股則議論三代鄉學不同之故，在於鄉人之教養易陋，必須因時因地制宜。異於鄭氏「以經釋經」，洪氏在中二比展現了議論的才華，誠如林乃營所評謂：「是燕許大手筆，非郊島寒瘦詩也。」<sup>114</sup> 此外，也顯現了他的批判性格，「儒生則古稱先，而考據未真，謬以變置測前人」、「士風日新月異，而根本不植，謬以淹通當學問」，此二句極具批判性。此文撰於戊子年（光緒 14 年，1888），棄生 23 歲，除了年少氣盛，大概也是性格使然。<sup>115</sup>

這兩篇八股文其實都只有六股，這是清代中期以後八股文的常態。李旭說：「清中期以後，六股的文章占了主要地位。」<sup>116</sup> 王凱符說：「有些八股文章，六股已把題意說盡，束二股可以略去，……清代後來之八股文多作六股即因此。」<sup>117</sup> 後二股「從中二股承接而來，中二股沒有說到或說得不夠的意思，要說全、說盡，可以通過聯想等，拓寬提意，使題意顯得更加豐滿，也可以就前邊的議論加以咏嘆、發表感想。所以後二股常是作者最用力氣苦心經營的部分。」<sup>118</sup> 鄭氏和洪氏都把握了這個原則，在後二股中盡力發揮。

## （七）「後比」之比較

鄭文的「後比」已全錄於本篇論文的〈前言〉，此二股亦大量引用

<sup>113</sup> 同上註，頁 3152-3153。

<sup>114</sup> 同上註，頁 3155。

<sup>115</sup> 程玉鳳說洪棄生「個性堅毅，疾惡如仇，擇善固執，貫徹到底。」見程玉鳳，《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頁 321。

<sup>116</sup> 李旭，〈八股文淺說〉，收入趙基耀、李旭等編著，《清代八股文譯注》，頁 19。

<sup>117</sup> 王凱符，《八股文概說》，頁 14。

<sup>118</sup> 同上註，頁 13-14。

經典。

第五股由正面論教化之典常，筆者在〈前言〉中已說明「三德、三物」引自《周禮》，三德和三物包含了從國學到鄉學的內容，故說「統遐邇親疏而同此意」。此外「夏曰彝倫，殷曰人紀，周曰彝教」，分見於《尚書》〈洪範〉、〈伊訓〉和〈君奭〉，彝倫即倫常，人紀指爲人之綱紀，彝教爲道法。<sup>119</sup> 倫常、綱紀、道法，都是帝王的教化，內容相近，而名稱不同，但都是世族子弟所當依循的，應該力行教化，這是第五股的重點。

第六股從「簡綹」的角度拓展題意，全段脫化自《禮記·王制》之內容甚多。「簡綹」一詞來自〈王制〉：「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綹惡。」「樂正造士，示天下以禮樂詩書」變化自〈王制〉：「樂正崇四術主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sup>120</sup>「不肖」之稱，三代不同（夏之蠢愚、殷之放蕩、周之利巧），對這些不肖者並非「不（改）變即屏（棄）」，而是「惟后綏猷而後乂」。「惟后綏猷」典出《尚書·湯誥》：「克綏厥猷惟后」，<sup>121</sup> 綏，安撫，猷，法則；「而後乂」，乂即刈，除草也。全句的意思是，帝王先安撫才綹惡。而對於「貴介」和「鄉官」的標準又有不同，「貴介綦嚴，外此之族師黨正，無所用其簡稽也。」族師黨正見《周禮·地官司徒》，依據孔疏，鄉以下之行政區依次爲州、黨、族、閭、比，其長官爲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鄉官也。<sup>122</sup> 在簡綹方面，地方寬中央嚴，但鄉官經過選士可以「升司徒」、或進士而「升司馬」，<sup>123</sup> 最終朝野都離不開「簡綹」的法則。

鄭氏在後二股大量運用經典來論證題目中「皆所以明人倫也」之旨

<sup>119</sup> 晉·僞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頁 167、114、247。〈洪範〉：「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孔疏：「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頁 167）；〈伊訓〉：「先王肇修人紀」，僞孔傳：「言湯始修爲人綱紀」（頁 114）；〈君奭〉：「茲迪彝教」，僞孔傳：「以此道法教文王」（頁 247）。

<sup>120</sup> 以上皆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頁 256。

<sup>121</sup> 晉·僞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頁 112。

<sup>122</sup> 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159-160。

<sup>123</sup> 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頁 256。

趣，一股正論教化，一股反論簡絀。雖然用典多，用詞稍覺晦澀，但文意暢通，理氣充足。梁鳴謙評此文謂：「讀書能見大意，洋洋纚纚，如登先聖制作之堂，親承風旨，文筆偉麗。」<sup>124</sup> 此評最符合鄭氏此文「後比」的表現。

洪文的「後比」爲：

後王尚富強，造士不切於本原，故國之中，講錢穀者若而人，而鄉以下無論矣。國之中，習刑名者若而人，而鄉以下可知矣。紛紛之鸞旂芹藻，未嘗為孝弟忠信而來，豈不自貽百世學術之憂乎？三代以人倫立之的，而薰陶漸染，俊秀有操修，椎魯亦有懋勉。鄉士有踐履，農夫亦有率循。無一人不在人之中，無一人敢見棄於倫之外。而時而羽籥，時而鼓鐘，有血氣即有禮文，有知能即有性理。不必家喻戶曉，而人人懷堯舜之意，無非三代之聖人，有以啟牖於不知不覺者耳。（第五股）<sup>125</sup>

叔世崇末務，教人不歸於實行，故國之中，逐文藝者若而人，而鄉以下何責矣。國之中，耽記誦者若而人，而鄉以下奚求矣。濟濟之棧樸菁莪，未嘗為君臣父子而起，豈不壞千古學術之良乎？三代以人倫垂之則，而率作振興，詩書有性天，几杖亦有性誼。豆籩有禮讓，夏楚亦有敬恭。無一人不為倫常中人，無一人不為倫常中學。而時而讀法，時而懸象，有運動即有禮樂，有飲食即有絃歌。無俟刑迫勢驅，而人人懷禽獸之憂，要皆三代之美法，有以誘掖於易知易能者耳。（第六股）<sup>126</sup>

此二股承「中比」的批判性，第五股批評後王重錢穀、習刑名，而忽略人倫，認為人倫無所不在，當潛移默化之；第六股批評後世逐文藝、耽記誦而忽略人倫，認為教化無處不可施，當於生活中學習也。

<sup>124</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358。

<sup>125</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3153-3154。

<sup>126</sup> 同上註，頁3154-3155。

在文法修辭上，這兩股幾乎都用排比成文。以第五股為例，有「句子的排比」，如：「國之中，講錢穀者若而人，而鄉以下無論矣／國之中，習刑名者若而人，而鄉以下可知矣。」「俊秀有操修，椎魯亦有慙勉／鄉士有踐履，農夫亦有率循。」有「句子成分的排比」，如：「無一人不在人之中／無一人敢見棄於倫之外。」「時而羽籥／時而鼓鐘」「有血氣即有禮文／有知能即有性理」。一股中用了五次排比，而中間多以散句隔開，因此不會感到過於板重。宋陳騭《文則》：「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爲古文霸，於此法尤加意焉。」，<sup>127</sup>「在文章裡善用排比，可以極大地增強語言的力量，表現磅礴的氣勢和廣闊的內容。……韓愈的文章，被後人稱讚『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蘇明允〈上歐公書〉）」，排比的恰當運用是其中重要的因素。」<sup>128</sup>

鄭文後二股也運用了排比，如：「夏曰彝倫，殷曰人紀，周曰彝教」、「德有三，物有三」、「夏之蠢愚，殷之放蕩，周之利巧」、「升司徒，升司馬」，但都屬短句，在氣勢上，就沒有洪文那麼浩瀚磅礴。

### （八）「收結」之比較

收結就是收束、總結全文。

鄭文的收結爲：「遵斯義也，通德隆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父老攜杖，而觀德化之成以此也夫。」<sup>129</sup>洪文的收結爲：「聖王無成見，學宮沿一定之模，司徒有惠心，學校修五常之典，鄉學國學胥道也。」<sup>130</sup>

鄭文的收結撇開題目中的「學則三代共之」，只以「德化之成」呼應「皆所以明人倫」（德化的目的就是明人倫），認爲只要遵照上述的義理，無論京城邊疆，均可隆其德、揚其名，以觀德化之成。洪文則以「學宮沿一定之模」，呼應題目中的「學則三代共之」，即三代國學沿用一定的規模，不必改變，再以「學校修五常之典」，呼應題目中的「皆

<sup>127</sup> 宋·陳騭，《文則》，收入《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86）卷下，頁1。

<sup>128</sup> 黎運漢、張維耿著，《現代漢語修辭學》（臺北：書林出版社，1997），頁148-149。

<sup>129</sup>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中）》，頁358。

<sup>130</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3155。

所以明人倫」，國學鄉學皆需施行五倫之教，皆合於治國之道。相較之下，洪文的收結似乎較能回應題旨。

在文氣上，二文的收結都用對偶，不過論氣勢，還是洪文略勝一籌。

以上就鄭用錫、洪棄生的同題八股文中的破題、承題、起講、起比、出題、中比、後比及收束作了比較，八股文中還有「入題」，是一兩句過渡性的文字，可有可無，因此從略。

洪棄生另外一篇〈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亦善用排比。例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三代所以教人於野，而猶未及教人於朝也；此三代所以興行於鄉，而猶未及興行於國也。」其收結謂：「闡名教以正人心，亦布王道以開知覺，遵循祇此常理，而前聖之所以翼世者其意微：人倫之道明，學校之教興，小民之俗變矣！」<sup>131</sup> 皆能一氣直下，頓挫有力。

## 四、結語

前賢認為鄭用錫的八股文有「根柢深、枝葉繁、氣勢盛」三個特點：根柢深主要指他的經學基礎深厚，從本文的分析可以證明；至於枝葉繁，當是指他的文章內容能夠多方面延伸發揮，這一點從〈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這篇的第六股能夠從教化的反面「簡(不肖)細(惡)」立論亦可以證明；然而在氣勢方面，由於大量引用經書，使文章較為典重，氣勢上略遜於洪棄生。

洪棄生的八股文也有「雄渾」之譽，其特點有三：第一個特色是他善用排比，使文章創造出浩瀚磅礴的氣勢。第二個特色是「批判性」，從〈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一文來觀察，他在中二股以「謬」字議論儒生、批評世風，在後二股更批評後王重錢穀、後世逐文藝，而不重人倫，由於「後王、後世」可以包括當下，這種批評可能受到趙南

---

<sup>131</sup> 清·洪棄生，《寄鶴齋制義文集》，收入《洪棄生先生遺書（七）》，頁3155。

星的影響，多少具有「寄寓時慨」的色彩。第三個特色是評者認為其文合於「正嘉家法」，也就是「以古文為時文」，羅軍鳳認為：「明代正德、嘉靖時期的時文，頗有古文矩度，融化經籍子史，大多言有來歷，一以經義為歸，看似平淡，其實豐蘊，是時文的標準樣本。」<sup>132</sup> 清代「以古文為時文」的代表是方苞，方苞「強調文章的雅潔精鍊和行文之法」。<sup>133</sup> 相較於鄭用錫，洪棄生的八股文很少直接引用經典，確實不失雅潔的風格。

鄭用錫和洪棄生都是臺灣古典文學方面的卓然大家，他們的八股文也備受推崇。想要深入了解他們的八股文成就，除了熟讀作品，透過比較也是一種有效的方法。本文概述了他們的八股文內容及特色，並選擇二氏唯一的同題作品進行客觀、具體的比較，庶幾可使二位先賢的八股文特色與成就更為彰顯。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三國·王弼著，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晉·偽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

宋·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76年。

---

<sup>132</sup> 羅軍鳳，〈方苞的古文「義法」與科學世風〉，《文學遺產》2008年第2期（2008年2月），頁130。

<sup>133</sup> 李建中，《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281。

宋·陳騭，《文則》，收入《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86年《四庫全書》本。

清·方苞，《欽定四書文》，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5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 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1986年《四庫全書》本。

清·鄭用錫，《北郭園全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京都：中文出版社，1983年《粵雅堂叢書》本。

清·洪棄生，《洪棄生先生遺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0年。

清·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年。

清·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寄鶴齋古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年。

清·劉熙載，《藝概》，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5年。

清·唐彪著，王剛譯評，《家塾教學法：經典譯評版》，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7年。

清·唐贊袞編，《海東書院課藝》，臺南：海東書院刊，1892年（光緒18年）。

## 二、近人論著

王凱符，《八股文概說》，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本杰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潘瑋琳、張琰、曹南屏等譯，《經學·科舉·文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臺北：文復書店，出版年不詳。

李建中，《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周作人，《看雲集》，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

洪銘水，《臺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范文鳳，「鄭用錫暨及其《北郭園全集》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6月。

徐志平，〈嘉義進士徐德欽的科舉歷程及其八股文表現〉，《閩臺緣》2019年第3期，2020年2月。

商衍鎰，《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

許俊雅，《臺灣文學散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4年。

陳才訓，〈由《制藝叢話》看明清八股文生態〉，《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8期，2016年8月。

陳光瑩，《臺灣古典詩家洪棄生》，臺中：晨星出版公司，2009年。

陳運棟，〈談八股文並介紹清同治辛未科張維垣、余顯榮兩位進士會試硃卷〉，《苗栗文獻》第13期，1998年11月。

陳運棟，〈謝錫光舉人中試的一篇八股文〉，《苗栗文獻》第14期，1999年6月。

游適宏，〈洪棄生八股文詮題立意試析〉，《輔仁國文學報》第46期，2018年4月。

游適宏，〈從《海東書院課藝》概觀晚清臺灣童生的八股文教育〉，《北市大語文學報》第20期，2019年6月。

程玉鳳，《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新北：國史館，1997年。

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冊4，臺北：文听閣圖書，2007年。

楊士芳，〈楊士芳遺作〉，《宜蘭文獻》卷2第1期，1965年12月。

詹雅能，《明志書院沿革志》，新竹：竹塹文化資產叢書出版社，2002年。

蒲彥光，〈談八股文如何詮釋經典〉，《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6期，2009年3月。



趙基耀等編著，《清代八股文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黎運漢、張維耿，《現代漢語修辭學》，臺北：書林出版社，1997 年。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3 年。

羅軍鳳，〈方苞的古文「義法」與科舉世風〉，《文學遺產》第 2 期，2008 年 2 月。

龔顯宗，《臺灣文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 年。

# **A Comparison between Zheng Yongxi and Hong Qisheng's Works of "Eight-Part Essay" — Taking the Same Topic Articles as an Example**

**Hsu, Chih-Ping<sup>\*</sup>**

## **【Abstract】**

Both Zheng Yongxi and Hong Qisheng were outstanding masters in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eir works of "eight-part essay" are highly prais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achievements in "eight-part essay",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compare them, besides reading the work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works of "eight-part essay", and makes an objective and specific comparison of their only works on the same topic, so as to mak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ir works of "eight-part essay" more apparent.

Zheng Yongxi's works of "eight-part essay" are known to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deep foundation, numerous branches and leaves, and vigorous momentum. The deep foundation mainly refers to his profound knowledge found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ile the numerous branches and leaves refers to his extensive development in many aspects. As for momentum,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his essays

---

<sup>\*</sup>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re more classic and less powerful compared to Hong Qisheng's, due to a large number of quotations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Hong Qisheng's works of "eight-part essay" are also known for their quality of "sublime". This is due to his sophisticate use of parallelism, which can really create a vast momentum. The second feature is "criticalness", because his works of this genre often contain his criticism over the society. The third major feature of his works of "eight-part essay" is that they are in line with the "Zhengjia Family Law", which is "taking ancient proses as contemporary proses" and emphasizes "the elegance and refinement of proses as well as the way of writing".

Compared with Zheng Yongxi, Hong Qisheng's works of "eight-part essay" seldom directly quote classics. Besides being powerful, a quality of elegance can also be conceived in his works.

**Keywords:** Zheng Yongxi, Hong Qisheng, eight-part essay, Taiwanese Litera

